

成长就是学会自己做决定

□杭州市大关实验中学 梅丽华

为人父母,总是有操不完的心,明明知道孩子养成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”的习惯不好,但总担心孩子穿多了出汗,穿少了冻着,忍不住帮孩子做这做那。似乎只有替孩子做了决定,我们才能放心。

亲子冲突源自人身权利之争

假期中,班级里出现这样一个案例。小京妈妈赶着要出门体检,安排小京边吃早饭边上网课。

“谁让你给我报课的? 我不想上! 我约了朋友。”小京的抗拒其实是一种反感被安排的表现。

妈妈坚持己见:“可以边吃饭边上网课,不影响你和小伙伴玩。”一旁的爸爸也忍不住介入:“听你妈妈的安排。”

小京更生气了。
爸爸加重语气:“你会安排吗? 自己不会合理安排,就要听从安排。”

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小京的情绪,他愤怒地咆哮:“我就是不上!”

爸爸气得要去拿戒尺,一场激烈的亲子冲突在清晨爆发。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,在很多家庭都会出现。

我自己也常常出于“为孩子好”的动机,替他安排、代他做决定,却忽略了询问孩子内心的需求。

有一次,儿子对我说:“妈妈,明天要背诵课文,今晚的时间我要全部用来复习语文。”

虽然我知道他的数学更需要复习,但我没有强行说服他,只是回答:“好,你自己安排。”

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:让孩子自己做决定,哪怕他可能犯错,也是成长的必

由之路。

谁也不想别人替自己做决定

我们会不经商量,随意替一个成年人做决定吗? 应该不会,否则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。但我们总是喜欢替孩子做决定,为了让他们“少走弯路”。同样的,孩子也会在一次次被包办、被安排中感觉到不被认可、不被尊重。

我曾要求班里学生每人带一块抹布到学校,每周五打扫卫生时用自己的抹布擦拭课桌。

于是,学生们从家里带来抹布,挂在讲台下方的钩子上,各式各样,花花绿绿,格外惹眼。

抹布挂上去的第一时间,我就注意到这不太美观。但因为刚打扫完,抹布都是湿的,我想最好先挂上一天,等晾干后再收进柜子,所以暂时让其保持原样。

可还没等我通知学生,就被学校领导看见了,强制要求我取下抹布并让学生带回家。

因为是上级指令,我没有当场反驳,也不愿与之正面冲突,只能不情愿地让学生把抹布取下来。当时我的心里很不舒服:作为班主任,难道连让学生挂一块抹布的权利都没有吗? 连这么小的事都要管,我们还有一点自主权吗?

推己及人,学生被强制要求的时候何尝不是这种心理呢?

学生需要这份自主权,哪怕是很小的自主权。

学生也知道自己尚不成熟,处理事务有时不是很妥当,但他们不一定需要被直接告知该怎么做,而是需要时间去自我觉察、自我消化。我们要做的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,给他们成长的机会。

选择权的使用是需要训练的

许多家长给予孩子充分的物质选择权,如让孩子选择衣物、食品、旅游目的地,但会在学习安排、时间规划等“看不见”的层面代为主。

弯路是少走了,踩坑是避免了,但同时,孩子也可能失去探索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,已有强烈的自我意识,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,这时候如果父母不充分让权,亲子冲突不可避免。

可见,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,更需要在精神上被重视、被信任。

孩子总归是要对自己负责的,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吧。我们大可以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,在每一处细节之中,告诉他们“你可以”,虽然结果也许不如预想中完美,但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

另一个案例也发生在假期中。小林妈妈发现儿子的笔记字迹潦草,提醒他可能会被老师要求重写。

儿子不以为然,认为笔记是给自己看的,还拿同学字差却无人在意作比较。

妈妈指出:“那个同学的妈妈不是不想管,而是因为他的字实在太乱,实在管不了他。”

小林表示,把字写好,做作业就要花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。

妈妈说:“如果老师不满意,让你重写,是不是浪费更多时间?”

权衡了利弊,清楚了代价,小林虽然嘴里仍嘟囔着,但明显放慢了写字速度,字迹比前一页端正了许多。

这个案例说明:只有经过思考的选择,才会内化为责任。小林妈妈引导孩子预想后果,并预想能否承担这样的后

果,以训练孩子的负责能力,值得广大家长借鉴。

同样,那些在教师看来是常识性的小事,有时候学生的思维却转不过弯来。此时,我们不必急于纠正,要给学生学习调整的机会,帮助他们理清思路——是为了短期方便还是要顾及长期发展?

比如中考志愿填报,我们可以提供信息、分析利弊、分享经验、给出建议,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应该交给学生,不强迫、不否定,让他们去选择、去书写自己的人生。

与此同时,在关乎安全、健康、法律底线等关键问题上,必须家校一起介入,给学生兜底。

在未成年人成长的路上,教师和家长不是答案,而是阶梯;不是指挥官,而是顾问团。应清醒地意识到,当我们为未成年人遮风挡雨,使他们看似一路顺风,却也可能为日后的逆风埋下伏笔。

成年人的焦虑从来不在于孩子,而在我们自己——没有学会放手。爱不是为孩子做好一切事情,而是赋予其成长的权利,让其感受到人生是无数选择的集合。只有慢慢学会选择,在试错中走向成熟,人生路才会越走越好。



近日,诸暨市店口镇中心小学开展“小小银行家、财商伴成长”主题活动。活动联合台州银行、镇社工站、镇红帽子社工服务社等单位,为学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金融启蒙课。讲师讲解钱币发展史,设置角色扮演、金融小游戏等互动环节,带领学生沉浸式体验银行工作流程,普及反诈避险常识,助力学生树立正确金钱观与消费观。图为讲师手把手教学。(一转、二摸、三透光)人民币防伪知识。(本报通讯员 蒋金勇 摄)

不只“吹对”,更能“听懂”——音乐技能训练和审美教育如何相得益彰

□杭州市长青小学 朱浩

学期末口琴测评,一个男孩完整吹完《欢乐颂》,音准、节奏、换气全部正确。我问他:“你觉得这段音乐在表达什么?”

他愣了两秒,回答:“不知道,反正我吹对了。”

这个回答像一根针一样,刺破了我对音乐教学的想象。

我翻看班级过去一学期的口琴作业记录,发现能完整演奏曲目的学生占86%,但能在吹完后说出“我喜欢这段的哪个部分”“这段让我想到什么”或“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”的,不到20%。

“会吹但不懂”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技能训练与审美脱节的典型“症状”。好的口琴教学不是进行一场“手指加舌头的运动”,而是能让学生在吹奏的同时,感受到声音里的色彩、情绪和画面。

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扭转课堂。

一、收藏音色,再练音阶

传统的口琴第一课永远是从“do、re、mi、fa……”开始,枯燥且缺乏意义感。我把这个顺序倒过来,给学生布置第一周的任务:用口琴吹出“你觉得最好听的一个音”,然后录下来,再互相分享,并说出理由。

一个学生吹中音区“5”(sol)时说:“这个音不刺耳,也不闷,像秋天的阳光。”

另一个学生吹高音“1”(do),说:“它像早上的闹钟,但比闹钟温柔。”

我追问:“那你们觉得哪个音更适合表现‘安静’?”全班学生争论起来,各自试吹,用耳朵来判断。

第二周,任务升级:开心、难过、紧张、困倦……请吹出“最像某种情绪”的

三个音。有个女生吹了低音区下行音阶,说像“慢慢叹气”。其他学生模仿后,有男生反驳:“我觉得像走路踩到软泥巴,不是叹气。”争论中,每个人都在反复吹、反复听,不是为了“对错”,而是为了“像不像”。

直到第三周,我才开始教音阶指法。这时,学生们已经不再是机械地按下孔位,他们知道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性格。练音阶的意义突然变得清楚:不是要吹准,而是要能找到“我想要的那个音”。

二、先不示范,学生听选

传统口琴教学是“教师吹一遍,学生照吹”,这剥夺了学生审美判断的机会。我把每首新曲子的第一课时改为“听选课”。

教《小星星》时,我先不发乐谱,只给出三个选择。

快速还是慢速? 在探讨乐曲的速度时,我让学生们分别试奏了快、慢两个版本,随后举手投票并阐述理由。多数学生选择慢速,认为:“星星一闪一闪的,太快了就不像了。”少数选择快速的学生则表示:“我数星星的时候觉得很快乐。”

对此,我没有直接判定对错,而是引导大家总结出一个共识:速度的改变会影响音乐的情绪。

强奏还是弱奏? 在力度的处理上,学生们在试奏后也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觉得“强一点像星星在发光”,也有人认为“弱一点更能体现星空的安静”。经过讨论,大家最终决定:第一遍采用弱奏,到了副歌部分再转为强奏,以此来表现星光“越来越亮”的层次感。

连奏还是断奏? 试奏后,有学生提议:“前三句用连奏,最后一句用断奏,

听起来就像星星在眨眼。”大家一致认为,这个方案最为生动贴切。

整节课我并没有直接教授指法,而是鼓励学生们自己去摸索音符、尝试演奏。当天放学后,一个家长发来消息说:“孩子回家后主动吹了半个多小时,还兴奋地告诉我,他是在设计自己的《小星星》吹法。”

当“应该怎么吹”变成“我想怎么吹”,审美判断就启动了。

三、不考曲目,考写文章

期末,我取消了演奏考试,换成一项大作业:“给一年级新生写一份口琴说明书——用文字、图画或录音告诉他们,口琴的声音有什么特别之处,为什么值得学。”

评价标准只有三条:有没有表达出口琴的特点;能不能让别人听懂你的描述;能不能引发别人对口琴的兴趣?

交上来的作业五花八门。最打动我的是一份手绘小册子,开头写道:“口琴的声音像夏天的风,不吵,但你能感觉到它在。吹的时候要轻轻呼气,像在吹热汤,不然它会哭。”后面配了表情包——不同吹气力度下口琴的“表情”。

这个学生演奏技巧在班上只能算中等,但他已经完成了从“操作者”到“感受者”的转变。他知道口琴为什么“好听”,并且能用语言传递这种感觉。这比学会吹十首曲子更接近音乐教育的本质。

审美感知不是技能训练的点缀。实际上,它是技能的动力系统——只有学生觉得“好听”,才愿意忍受枯燥去“练好”。当口琴课从“指法操练”变成“声音探险”,学生眼里的光远比考级证书明亮。

静夏柳1

教师配备“小蜜蜂”往往是一种无奈之举。在小学阶段,使用“小蜜蜂”最多的是低年级教师,以及教语文、英语学科的教师。

低年级教师不仅用嗓频率高,还得提高嗓门。刚进入小学的学生对新环境有一段适应期,课堂习惯和活动纪律都需要教师一遍遍地强调。此外,下课后“告状”的学生也多,教师需要不断应对处理。

面对低年级学生的自由散漫,教师有时不得不提高嗓门,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。常常有教师在一年级上学期开学仅仅一个月后,嗓子就哑了。

面对这种高强度的用嗓压力,为低年级教师配备“小蜜蜂”,可以让他们适当放低音量,从而有效减轻用嗓负担。

黄徐君

“小蜜蜂”的使命是什么? 它是在特定时期(如一年级新生刚入学)帮教师托底的过渡性工具。在良好课堂秩序和师生默契建立之时,它的使命就可以宣告完成。

结合25年的教学经验,我认为“小蜜蜂”的退场,正折射出以下3个层面的转变:1.声音传递从“物理扩音”走向“情感共鸣”;2.课堂秩序从“他律约束”走向“自律默契”;3.教师的成长不被工具异化。

“小蜜蜂”像是一根拐杖,在我们身体疲惫或面对纷乱时可以向它借力。但教育的终极目的,是让我们和学生都能独立、舒展地行走。

当我们自信地收起“小蜜蜂”,用最自然、最温润的声音和学生对话,而台下学生依然眼神闪亮、秩序井然时,那便是我们作为教师最幸福的时刻。

葛永锋

新建的标准教室,教师以适中的音量授课,学生一般都能听清;而在室外或阶梯教室等开阔空间,由于声音容易发散,借助“小蜜蜂”等扩音设备便成了刚需。

使用扩音设备确实有其合理性:一方面能保护嗓子,预防声带磨损;另一方面也能确保后排或听力较弱的学生听清讲课内容,避免因听不清而走神。

然而,尽管条件允许,但我一直没有使用扩音设备。这基于以下几点考量:

首先,出于最朴素的出发点,只要我的声带没有大碍(体检正常),我更愿意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听到我真实的声音。

其次,扩音设备会改变人声的质感。长期听放大的电子音效,学生容易产生听觉疲劳;若音量把控不当,声音过响、有回声或杂音,反而会干扰学生的思维,分散其注意力。

再次,全程依赖扩音设备,容易给人一种“用大音量盖过一切”的压迫感。设备会将极微小的声音无限放大,如教师不经意间的咳嗽声,听觉体验极差。

龙泉许大宝

从理论上讲,操场空旷嘈杂,体育教师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扩音设备,但我所在办公室的10多位体育教师几乎都不依赖它。一天几节课下来,虽然大家体力消耗极大,但也只是在课间回办公室喝口热水、稍作休息,铃声一响又立刻到操场上大声喊口令。

但有的时候我也深感无奈。

我曾带队参加“吴越杯”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。在一场决定能否进入八强的关键之战中,上半场,我方球门离看台较近,每当对方带球过半场或发界外球时,我便拼命进行技术喊话。队员们听到指令后死死管住对手,成功将对方的进攻化解在禁区之外。身旁的球迷也被我的大嗓门震慑。上半场,我方1:0领先。然而下半场交换场地后,我方球门换到了另一边,与看台相距200多米,我的喊话队员们完全听不见。不到两分钟,对方就连进两球。最终,我们输掉了比赛。

体育教师的好嗓门并非天生,而是后天在操场上一點一點练出来的。

教师话坊

中国教育期刊优秀作品评选金奖栏目

此话题可继续探讨——

